

事实与真相的双重考量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环县事变探实

杨 东

内容提要 环县事变,因国民党军事摩擦以及税收负担和征粮工作失当引起。然则在事变的陈述意义与陈述真相之间,却涵括着诸多体现历史真相的事实集合。这些事实集合,不仅是厘清事变原委的深层本相,也是联接陈述意义与陈述真相之间的逻辑基础。进一步追寻,中共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社会生态异常复杂的乡土社会开展革命,必然会呈现出革命与乡土规则之间融合、矛盾乃至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这也表明,传统乡土规则在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即便是中共革命向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同样会面临“内卷化”危机。

关键词 环县事变 陕甘宁边区 基层政权 乡土社会

杨 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300134

由“事实”走向“真相”,再由“真相”而达到某种“意义”的集合,无疑是构成历史研究的生命所在,也是历史学者一直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本文所要追寻的是发生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环县事变。这次事变是一起严重的群体性哗变事件,也是自陕甘宁边区成立以来所仅见的严重事件。就客观事实而言,环县事变起因于国民党在根据地的军事摩擦。然而实际原委绝非只此一端,近年来相关论著也对此开展过讨论。但是已有的研究在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的学术追寻中,却缺乏相应地寻踪演绎。换言之,对于环县事变的探究应注重事实与真相的双重考量,既要注重由“事实”推演“真相”,也要从“真相”中回观“真正发生了什么”,进而形成一种“意义”的集合。尤需注意的是,在利用边区和地方政府的史料资源中,特别应注意陈述意义与陈述真相之间的区别。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事实与真相之间切实解答:“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如何知道它的”^[1]。

一、环县事变:事实陈述及已有的解释

就一般意义而言,任何突发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时空决定因素,当特定的因素把空间和时间作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13FDJ003)阶段性成果。

[1]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斯坦福认为:陈述的意义与陈述的真相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历史事实与真相之间,我们是由“事实”走向“真相”,又从“真相”迈向“真正发生了什么”,最后则到达组成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如何知道它的”。参见[英]迈克尔·斯坦福:《历史研究导论》,刘世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11页。

不可分割的联系赋予这一事实,事件的发生便成为可能。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整个战争局势的变化以及陕甘宁边区物质供给的艰难现状,使得环县事变的发生具备了客观基础。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世界格局的走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内外政策也进行了相应地调整。其中在抗日根据地发起军事摩擦,就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向。1939年至1940年间,正值国民党对抗日革命根据地掀起反共高潮之际,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下令“以武装占领进攻环县”,陇东专员钟竟成同时给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和环县保安大队赵思忠去信,要求他们“以打游击的办法”破坏环县,配合陇东摩擦^[1]。于是,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唆使赵思忠率土匪百余人,发动了震惊边区的环县事变。事变发生在1940年初,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赵思忠,率众偷袭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所属环县党政机关,并在环县各区实行策反叛变活动。他们大肆散布谣言,在民众中间突然组织哗变,许多群众起而闹事。同时又率众策划自卫军叛变。相关资料显示,在此次策反叛变的极端事件中,竟有5个区和25个乡的村干部,包括刚刚征集的新兵在内约700人左右(有的资料认为是八九百人)的叛乱^[2]。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环县各区乡叛变情况统计表^[3]

| 区名 | 共有乡数 | 叛变乡数 | 说明 |
|-----|------|------|-------------|
| 耿湾区 | 6 | 5 | 第六乡未叛变 |
| 车道区 | 6 | 5 | 第五乡未叛变 |
| 洪德区 | 7 | 6 | 第三乡未叛变 |
| 环城区 | 8 | 4 | 二、四、六、八乡未叛变 |
| 虎洞区 | 6 | 5 | 第五乡未叛变 |
| 毛井区 | | 未叛变 | 自卫队新兵提前解散 |

陕甘宁边区作为战时中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据点和模范的根据地,何以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叛乱?鉴于这次叛乱的严重后果,无论是当时的边区政府还是后来的历史学者,都从各自的视角对这次事变予以阐释和解读。

在边区政府看来,环县事变完全是一次“大造反”^[4]。谢觉哉径直指出,这是因为地方工作“患了病”,并给出了五条“病因”:一是地方领导“了解与把握大的政治方针不够”;二是负责同志“对边区党的任务的认识不够”;三是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工作的方式与实质”;四是“不了解党是怎样领导群众”;五是“宣传教育工作差”^[5]。中共陇东分委则指出,环县在组织扩大武装时将反革命分子纳入保安队,“结果发生整个分队的叛变,勾结股匪配合袭击我环县县级机关”;事变之前区县领导“均有官僚主义及政治上麻痹思想”,对于敌特分子的秘密活动,“领导上仍置若罔闻”;征公粮扩兵时,以“提早完成,大量超过”等口号做宣传,在执行中却用“老鹰抓小鸡”的办法扩充兵员^[6]。

学界对环县事变的论述,多半是从两个层面上加以阐释:一是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是这一事变的根本致因;二是由于农业税收负担过重以及征粮过程中出现的不当工作方式而引起的。《陇东革命根据地》一书认为:环县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地挑起来的。其目的就是妄图驱逐共产党和八路军出陇东,占领陇东根据地,实现其独裁统治^[7]。黄正林则认为环县事变的发生,是基层人员在征收救国公粮时强迫摊派现象严重,公粮负担不平衡,征粮委员会干部文化水平低粗暴执法,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给予仇视中共政权的人以可乘之机。正是征粮中的种种弊端,导致了“环县事变”的发生^[8]。

毫无疑问,上述各方对环县事变的事实陈述,都有其客观依据和事实基础,都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事变发端的缘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国民党的军事摩擦和主观因素上解读环县事变的发生,尽

[1]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编:《甘肃省志·公安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2][6]《关于一九四〇年环县自卫军叛变事》,庆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案卷号:1093。

[3]《陇东革命史料选辑(一)》,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159-160页。

[4]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5]《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编,第434-443页。

[7]《陇东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陇东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8]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管是阐释这一事变的基本思路和作法,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此陈述是否已完全揭示出环县事变历史的真实。进而言之,在环县事变的“陈述意义”与“陈述真相”之间,已有的阐释是否达到了统一。迈克尔·斯坦福在讨论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的关系中,认为“陈述的意义与陈述的真相之间是有区别的”^[1]。按照这一逻辑,环县事变因国民党的军事摩擦以及公粮负担和征粮过程中的不当所引起,实际是一个有意义而无真相的陈述。

第一,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摩擦,并非只局限于环县地区。据中共内部文件记载,仅在1939年底,国民党就在陕甘宁边区内外组织土匪达四十余股,挑起的事变有陇东事件、旬邑事件、瓦窑堡事件、杨家园子事件、延川事件、靖边事件、神府事件、鄜县事件等,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2]。可见,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制造的军事摩擦和事件不可谓不多,造成的影响和破坏也是较大的。需要追问的是:何以在别的地区发生摩擦,为什么没有发生如环县这样大规模的叛变?

第二,税收负担过重以及征粮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固然是环县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样的问题在边区其它地方也存在着。最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一个实例,是陕甘宁边区所属清涧县的一个农妇,因连续干旱收成极少,村干部三天两头催交公粮,态度极其恶劣,以至喊出了“雷公不劈毛泽东”的怨言。即便是模范的延安县,也曾出现过税收负担重民众发牢骚的情绪。延安县长刘秉温曾报告说,上级给延安县抗战动员工作的任务“是全边区二十几个县中每次动员工作最重的任务”,而“人民生活的基本方法还是农业,农业技术亦和其它各县一样”。故此有人发牢骚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有的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3]。

第三,所谓土匪挑唆之因,同样不能完全解释其中的缘由。匪患作为西北地区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一直广泛存在着。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报告,陕甘宁边区大大小小的政治土匪有四十多股,这些土匪为非作歹、到处抢掠,甚至出现过截刺周恩来的的惊人事件。由此同样需要追寻的是,既然陕甘宁边区存在着众多政治土匪,何以是在环县而不是在其它地区造成如此严重的哗变事件。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忘记历史的一种面貌而记住其另一面貌,那只是精神生活的节奏表现。”^[4]换言之,探求历史的真实,绝非仅仅停留在“我们知道的是什么”,而是应进一步思考“我们是如何知道它的”。正是从这个层面上,希拉里·普特南指出:“如果我们能就某一事实给出一个真的、恰当的标准,我们会看到大量因素起着作用。”^[5]因此,在追寻环县事变的历史事实的同时,依然需要进一步寻踪其历史真相。

二、“长时段”视角:环县事变的历史因缘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指出,以地理、社会组织、经济、社会心理等组成的社会结构,亦即“长时段”,对于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以此为视角审察“环县事变”,显然也是有着重要的认知意义。

环县地处陇东,是陕、甘、宁、三省的交界地带,曾经的环县是林茂草丰之地,然自秦以来因推行“军屯”和“移民实边”的政策,渐而形成了“山童水劣,世罕渔樵”^[6]的恶劣生态环境。民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灾荒肆虐、病灾洪害接踵而至,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的呈报中即显示,甘肃各地因持

[1][英]迈克尔·斯坦福:《历史研究导论》,刘世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11页。

[2]《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编印,第80、78-79页。

[3]刘秉温:《三年来我们怎样建设延安县》,《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

[4][英]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页。

[5][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6]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5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31页。

续的天灾兵祸,民众无望秋收,导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灾民达百万以上^[1]。流民增多势必会铤而走险操起土匪生涯。这样的场景是近代中国不少地方都曾出现的一个通病。因为破产的农民为免死起见,只能“大批地加入土匪队伍”,而土匪的焚掠,又会“将富饶的地方变成赤贫,转而使更多的贫农破产而逃亡”^[2]。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环县这个“白军也不驻扎的地方”^[3],结果却成为土匪活动的场所。

实际上,在环县聚众为匪、成立民团,一定意义上也是普通老百姓较为常见的生活方式。当年李富春就曾如是说道,环县等地“因为地广人稀与统治力量薄弱,民团组织仍相当发展,同时土匪民团也易横行。一方面群众为保家安命起见,加入哥老会,一方面因摧残与灾荒,农村失业增多,如是民团土匪流氓中,哥老会更是不少。因此,哥老会、民团、土匪、流氓在群众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4]。在如此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之下,中共几乎从进入环县以来便出现了土匪策反和游击队叛变的现象。就在1936年6月环县解放后一个月,赖传珠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

7月31日:二十八军一连人在羊圈山已逃跑,令骑兵游击队开去,通知各部队严防。

8月1日:得到县军事部消息,洪德城游击队叛变。

11月21日:毛居井游击队叛变;环县之五、六、七乡发生反革命暴乱,游击队叛变。红二团已开去镇压。

12月10日:开群众大会处决一名叛徒。下午应八乡群众要求,又杀一个反革命分子。

12月12日:近来加强教育解释工作很重要,已经发现个别落后分子看到敌人进攻,发生动摇。因此写信给二团牛[书申]关于加强解释工作及其内容。并给该团朱、牛首长写了一个关于军事部署的指示信。接富春信,坚决去七、八乡干一下。找三连连长,叮嘱他加强警戒,派出街里游动^[5]。

驻扎在环县的陕甘宁省委的报告也显示,仅1936年各县相继发生“有七八个游击队叛变的空前未有现象”,“连带发生部分的区乡工作受着破坏,群众受着摧残,赤化工作不能开展,苏区不能完全联系,民团土匪在某些地方也更加横行”^[6]。可见,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环县,已然出现了土匪骚扰和游击队叛变的情形。如果说复杂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为土匪的滋生与发展提供了条件,那么环县土地革命的不彻底,又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土匪势力的蔓延。

环县是红军长征入陕之后在西征途中被解放的。其时,红一方面军在西征期间进入环县,解放了环县全境,并在环县河连湾建立了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随后又成为陕甘宁省委所在地。环县尽管从解放以来就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但“大部分地主之地未分,并分过的亦未分完,可说全部都有地,而没有地的是个别的”。即便没收来的土地也“恐无人去种,因是地广人稀,如一个庄子一家人,到处无人去。再还有土豪之地,过去虽宣布没收,因没人要,后土豪回家,有耕种的”^[7]。即便到1939年,根据环县政府的报告,“在毛、车二区有数10里的旋梁,虎、耿、洪三区亦有不少的荒山难以清楚数目。有无地主的,即是有地主的,自己也不清楚”^[8]。这些报告都清楚地说明,环县的土地革命并未出现人们所想象的“分田分地真忙”的历史场景。这也正是“该县土地与其它县份不同的地方”^[9]。实际上还不仅如此,即便是开展了土地革命也是很很不彻底的。这在马锡五的报告中可以窥见一斑。

[1]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编:《甘肃省志·民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2]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年版,第812页。

[3]《王首道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5]《赖传珠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72、76页。

[6]《省委对进行游击战争与游击队的突击的决定》,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00505-211。

[7]《环县二、三月份工作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2-1-125。

[8]《环县政府1-3月工作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2-1-149。

[9]《庆环分区八月份工作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2-1-136。

据马锡五的报告称,过去在没收地主土地时,有的仅“是在群众大会上临时召集就将土地分配了。存根证据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将地主的牛羊驴粮等分配了,“其土地与帐债一点未动,也未宣布没收”。而且即便分得土地也“不敢要,待部队走后,他们就把土地仍旧交给了地主”。还有的是群众“在表面上他自己种了,可是结果他就偷偷的将种上的地数目交还给土豪,有的就帮助土豪来种,有的种上就暗中给土豪交租子。”特别是在分配土地时,一些下层干部保护土豪。正是由于如此,环县虽然是土地革命斗争中开辟的区域,但在土地分配方面“说起来较全分区(指庆环分区—引者注)任何一个县都差”^[1]。环县的土地革命比“任何一个县都差”这一判断,真切地说明了环县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很不彻底的情形。

由于土地革命时期这种不彻底的行为,助长了土豪劣绅与土匪势力的气焰。相关资料显示,只要一些豪绅地主假借哥老会之名,“我们下层干部被吓住了,也不敢管,更不去调查。”如有干部强力推行,他们便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把我们的干部推下去”^[2]。这样,土匪势力的扩张也就势所必然了。特别是随着赵思忠势力的逐渐增强,其骚扰抢劫的野心愈来愈大,对革命的破坏也愈来愈严重。就在红军过环县之后,赵思忠就实施过反攻倒算,打探“谁家住过红军,就专门抢谁家财产,抓谁家人”^[3]。环县解放后不久,赵思忠又开始骚扰摧残红军山城兵站,致使该站负责人王宏宝等3人牺牲^[4]。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1939年间,仅就“武装进攻与骚扰环县在百次以上。”^[5]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共进入环县开展革命以来,共计牺牲各级干部大约200多名。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去3个姓王的干部,就被敌人杀了两个^[6]。这些资料表明,在环县事变发生之前,即有为数不少的策反叛变事件。这也即是说,环县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因缘。

三、社会事实:环县事变的社会缘由

托波夫斯基在讨论历史事实与真相时,提出了“社会事实”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每一个历史事实,不管它是简单的或复杂的,都是一件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在其起源,发展或结果上,都是受到人类社会存在的制约的事实。……每一件社会事实从发展的结果这种意义上也都是历史的事实。”^[7]探究环县事变的历史真相,自当应注意这一因素。

“环处万山之中”的环县,由859架大小山梁环围。自然环境与交通信息的闭塞,形成了一个极度封闭的县域社会,由此也进一步强化了环县的地缘关系纽带。体现在环县事变中,有两个现象极为重要,一是民众对环县本地人赵思忠有一定的认同基础;二是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又加剧了这种地缘认同基础。

赵思忠出生于环县甜水,因排行老五故而有“赵老五”之称。其兄赵思聪是甘肃军阀陈珪璋部下的一个民团头目,赵老五便从其兄处获得了几十支枪,在环县招兵买马成立民团。随着赵老五势力的逐渐壮大,股匪越聚越多,终成环县一带惯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惯匪的赵老五在环县民众中却有相当群众基础,在民间被认为是一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人。对当地老百姓很讲义气,因而在当地民众中有较高的威望^[8]。在环县土生土长的赵老五,不仅在匪众民团中有较高的地位,而且存在着密切的地缘互保的纽带关系。据郭廷藩回忆说,当初新正县攻打被赵老五盘踞的湫头镇土围子时,结

[1][2]《庆环分区八月份工作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2-1-136。

[3]《陇东革命史料选辑(一)》,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1985年版,第159-160页。

[4]环县志比安全委员会编:《环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5]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1939年第8期。

[6]《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7]〔波〕托波夫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张家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24页。

[8]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果各地民团联合顽抗,拒不投降,“使我们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脚步窄狭,陷于被动”^[1]。

环县事变期间,赵老五匪徒正是以“本地人”作为宣传口号而发动这次策反和叛变的。在事变中,赵老五打着所谓“环县人不打环县人”、“八路军来了,我们是共产党。赵老五来了,我们还是自己人”等口号,就是以地缘纽带关系作为笼络民众的明证。为了消除这些口号的负面影响,中共环县保安大队长在回击时不得不以“环县人不打环县的好人,专打匪首赵老五,专打杀人放火抢群众东西的土匪”予以回应争取民众^[2]。除此之外,赵老五在环县还有其它一些口号。比如“环县亲戚朋友们联合起来”、“要收回牛羊”、“自己起来干”、“国民党要粮食要兵也不过如此”、“我们红也红过,干也干过,还是自己起来干”等等^[3]。环县开展扩兵征粮,因工作不当引起群众的埋怨情绪之时,这种情绪同样被赵老五匪徒以“本地人”的地缘情结所利用:“八路军又要打土豪了”,“征粮扩兵这是第一次,还有二次、三次、四次”。甚至造谣说:“红军要逃跑了,先征粮后征兵,把粮食征完,兵扩足(青年人征完)就要逃跑了。我是本地人,不会到远处打仗去,放心跟我来”,如果“反了跟我们走,就可以留在当地,不反被共产党征到远处去当炮灰”^[4]。赵老五一方面以地缘认同关系笼络人心,而环县民众对外来人员的戒备心态,又反过来加深了这种认同。相关资料显示,就在红军长征经过环县之时,即有不少民众因考虑自身安全逃离躲避的情形。一个叫张继英的农民曾说:由于红军说话很难听懂,周围的不少人“都吓跑了”^[5]。由此导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党与革命的影响是有限的。据马文瑞说,环县及至1936年底县委支部才建立起来^[6]。

更值得注意的是环县事变前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环县解放后,尽管中共对加强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关系的政治宣传一直在进行,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关于当时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具体复杂关系,笔者目前还没有找到更为翔实的历史资料。但是耙梳已有的材料,我们发现无论是早期的陕甘宁省委,还是后来谢觉哉的调查报告,以及时任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的言论,几乎都不约而同提到环县较为复杂的干部关系问题。

早在1936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给陕甘宁省委的信中就指出:“现在有些地方所谓工作团的代替与包办的方式,还在盛行着,他们觉得当地干部太不行做得太坏,不如直接[截]了当的亲自去干,还痛快些,并且免得麻烦。”这种现象实际是“自高自大的心理有关系,因为相信自己带来是万应灵药。撇开当地的环境不管,对当地积极分子和群众的意见可以不理睬,就是自高自大心理的表现。”基于这种现象,中央组织部要求“这种自高自大不相信当地干部的心理,无论如何要坚决去掉。决不能把老苏区的一套硬放在新苏区里去”^[7]。马文瑞后来在谈及陇东问题时也指出,当时的主要干部都不是当地土生的干部:一部分是陕北苏区的地方干部,另一少部分是由部队做地方工作的干部派出来的,这就形成了当时该地党的干部。“由于这一时期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是外来的,因而与当地的群众的联系是弱的。”同时“因为都是外来的干部,对当地情况不大了解,因而混进党内来(的)有相当数量的地痞流氓及投机分子”。同时,由于对本地干部的不放心,“政府里面无论大小事都要经过党来讨论,甚至连处理一件犯人的事情,都要经过党讨论”^[8]。

然而这种现象及至环县事变发生前依然存在着。谢觉哉在陇东调查之后不无遗憾地指出,尽管陇东工作同志在“政治原则”这一点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人事关系、态度问题,对个别事件看法

[1]《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2][3]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内部资料),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2年印行,第332页,第106页。

[4]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第245页。

[5]《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0年编印,第163页。

[6][8]《马文瑞谈陇东党史》,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00147。

[7]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第238页。

不同的问题,弄得关系很不好,给了工作以若干损失。”结果是“人家杀进门来了,还在闹关系”^[1]。由于这种较为复杂的关系,其结果便是一方面由于外地干部与当地的群众之间联系较弱而缺乏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即便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乡村积极分子心里也并不踏实,由于怀疑政府和外来组织形成的权威,他们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2]。正是由于缺少坚实的群众基础,导致环县事变发生之前竟然“没有一个群众给我们送信”,事变之中“没有一个群众向坏分子作斗争”,甚至“窝藏土匪的群众亦不在少数”。“环县有些地方我们是被动的,而土匪的消息非常灵敏。我们的队伍去围剿,即渺无踪影;队伍离开,土匪即出现。”^[3]正是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便利了赵老五在策反叛变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地缘关系加以利用。

可见,环县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环县地缘社会“共同体”的这种纽带关系休戚相关,而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又在“外地人”和“本地人”的身份识别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地缘纽带关系,进而出现了环县自卫军集体叛变的事件。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业已指出:“在中共建立的新的权力网络中,特别是在县级以上的政权机关中,其主要职务(如县委书记、县长)大多由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干部来担任。由于长期受到地方强人‘保境安民’口号和抵制外部势力(包括官府)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地民众在心理上不可能如此快地接受‘外人’的统治,即他们对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领导者表示出了怀疑甚至不信任。”^[4]这样的论述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黄宗智在分析传统中国乡村时就认为,中国村庄是由“个别农户组合的街坊”。在村庄内“工作和居住的纽带关系,又常和宗族关系交织而互相强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村庄是一个闭塞的、或许也是紧密的共同体”^[5]。如果说在这一“共同体”中,血缘关系是一种情感纽带,那么地缘关系则具有保障“安全感”和共同利益的作用。统观环县事变的发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折射的社会事实。

四、价值事实: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只要有一个世界,就得有一个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这个世界,要么是一个‘经验事实’的世界,要么是一个‘价值事实’的世界。”^[6]中共革命时代,向来都在强调和塑造干部的精神信仰与价值理念。然而,在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对接中,却仍旧幻隐幻现着不少历史残留。

领导机关和干部的主要任务在于掌握政策、贯彻政策之执行、积累和总结经验等。但是实际上政策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制度不统一的现象始终存在着。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表现最严重、最突出的恰恰是政策法令不能贯彻下去,下面的情况又不能及时反映上来。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决定和指示重视不够,许多县对边区政府指示不讨论,甚至不去看,执行也不认真。环县事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引发。亲往陇东调查此事的谢觉哉一再强调:环县事变的客观原因“只是原因的一方面”。因为“‘造反’是要赌身家生命的,不是不得已,不是懊了天大的气,谁肯来上别个的钩?这必然是我们工作有很大弱点”。比诸开荒,“挖得深,庄稼长得好;挖得浅,庄稼长得差;不挖,不长庄稼,但还不至于长荆棘。因此,应认识我们工作必有比不深入更严重的弱点”^[7]。这一个“弱点”,在基层干部的思想理念与价值事实之中,有着极为明显地体现。

首先,在一些基层干部的思想理念中过度依赖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建设方面存在着明显地不足。

[1]《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第437、443页。

[2]白向银:《在转变中的安塞工作》,《团结》第1卷第9期,1938年9月20日。

[3]《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327、335页。

[4]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

[6]〔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7]《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第434-435页。

相关资料显示,环县游击队在1934年冬成立,但当初仅有8人3支枪。尽管后来游击队发展到40多人,但是又因为游击队长逃跑,最后游击队不得不解散^[1]。当时的陕甘宁省委也发现很多地方“没有把领导游击战争与游击队视为赤化工作的第一任务”。以至于在随后的工作中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即在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时候,不能很好的了解与争取群众,进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结果使得不少群众成为一些哥老会与土匪争取的对象^[2]。地方政府一方面疏于基层武装建设,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过度依赖八路军驻防部队开展工作,以致于当环县面临土匪残酷劫杀的时候,因缺少得力的地方武装而不能迅速解围,只得求助于八路军驻防部队。如果驻防部队无暇顾及,一些地方干部便转而抱怨当地驻军“游而不击”^[3]。谢觉哉曾问及环县的同志:“如军队走了,工作还能进行吗?”谁都答:“没有把握”。因此他指出:“连老边区的环县还是这样,党的工作人员以军队名义出现,穿军装,骑骏马,俨然军人也。老百姓也把你当军人看待。”在调查完此事后,他对于“有枪杆子才有工作”的现象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利用军队开辟工作,当然便利”,但是“一开辟了,就要扶持本地干部”,建立党的群众的自身领导系统,由群众的自身发展才有力量。然而陇东工作“在枪杆子掩护下做,做的人和群众隔一条沟。群众有点怕。”所以“枪杆子一走,他就不来了”。这种完全依靠枪杆子的观念,真可谓“基础不固,瓦解无疑是易”^[4]。然而这种现象及至抗战爆发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没有较大的改观。曾担任中共环县保安大队长并参与环县剿匪的王世选就曾回忆说,当他去往环县时县委领导就告诉他说:

“因为县委和保安大队领导同志思想麻痹,缺乏经验,没有防范措施,忽视了县武装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没有全民防范的精神准备而造成的。”随后他又发现环县保安大队当初仅有“百余人”,因此不得不在重点乡和环城区建立了基于自卫军^[5]。由此可见,环县政府此前在地方武装建设方面的确疏于应对。事实上还不仅如此,即便已经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由于疏于进行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不少游击队员的思想观念是极其落后的。马文瑞在谈及此事时也不无感慨地说:“游击队多是农民,地方观念太浓厚,虽然苏区被攻破,然而他们不愿离开家乡,只要敌人稍加勾引就投降了。”^[6]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世选在环县剿匪时不得不针对当时的自卫军加紧补政治思想课,“提高他们为谁而战和保卫环县根据地,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以及消灭顽匪赵老五的自觉性”^[7]。

其次,对帮会组织认识不清,盲目建立统战工作。抗战之初,中共对帮会组织实行统战政策,以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力量开展抗日斗争。在此政策的指导下,1936年8月26日,陕甘宁省苏维埃在环县河连湾召集哥老会大爷80余人开会,并决定成立陕甘宁省“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筹备委员会”。然而这一组织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却出现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情状。有些参加过帮会的党员甚至忘却党的立场,参加帮会会议为帮会工作,他们公开夸大帮会的革命性和力量,甚至称帮会同共产党一样具有革命性。环县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中共的帮会政策时同样出现了偏差与失误。据马文瑞说当时曾将“争取哥老会而变成了重用哥老会”,甚至“单独组织哥老会的江湖游击队,使哥老会有了武装力量”。这样“混进我们游击队的哥老会分子也有”^[8]。特别是在组织扩大地方武装时,仍然将赵老五匪徒中的重要成员冯德录等吸收入保安队内,并任分队长^[9]。

由于环县自卫游击队中已然存在着帮会土匪分子,这就不仅导致部队纪律不太好,而且影响到部队同群众关系疏离,以致不少群众最后倒向赵老五。混入游击队中的帮会土匪分子更便利他们实施内部反水,进而也就造成了这些事实:杨丁山原为县府秘书,事变前几天秘密回到环县一乡发动与组

[1]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第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2][6][8]《马文瑞谈陇东党史》,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00147。

[3]刘懋功:《梦回吹角连营:一个老战士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4]《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第436页。

[5][7]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内部资料),第330页,第330页。

[9]《关于一九四〇年环县自卫军叛变事》,庆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1093。

织叛变；洪德区的仓库员龚殿明，事变前已勾结了赵老五准备该区二乡自卫军的叛变；郑文学为赵老五亲信之人，混到环县府当文书；杨文协是赵老五的探子，混到县府当财政检查员。环县事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马文瑞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就说，当时“对哥老会的态度是争取的，如设哥老会的办事处，并组织江湖游击队。争取哥老会的政策是对的，但组织江湖游击队是错的”^[1]。应该说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沉痛的。

最后，地方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式失当。就在环县事变发生的前一个月，边区政府发出征收五万石救国公粮的指示，其中分配给庆环分区 8500 石。尽管这次公粮征收的数量多任务紧，边区政府一再要求地方在征收时必须做到：“不应征收的应免收。应当征收的必须依照决定之累进数征收。其出租土地而应加倍征收的必须加倍征收。应减半征收之佃农，必须实行减半征收。其应行豁免者，必须豁免，不得强迫缴纳。”^[2]然而环县地方政府在征收公粮中却出现了工作方式失当以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环县的一些地方干部为完成上级交给的征收任务，提出了一些极端的口号，说要“提早完成”、“大量超过”、“不让一颗粮食放在仓库外边”。这样，所谓的征粮动员工作成了硬性摊派，“征粮给你摊四斗，你如推诿，就变八斗，不出不行”^[3]。环县县委宣传部长田丰年在耿湾区主持征粮扩兵工作开群众会时就说：“今天这个会议和过去不同，顶杀人占[战场]，你们都来，我便宰割你们，今天我给谁估计一石，就要出一石。如果谁不就要加倍征收，再不出，二鬼抽筋(就是拷吊)。”耿湾区委书记雷光辉在扩兵中，有一个老年人代替儿子来开会，他问那一老者，你为什么不教(叫)你儿子来开会。老者说他儿子有病，代儿子来开会。而雷光辉同志随即骂道：“你开会代替儿子开会，如果你儿子不在家，你可代替你儿子跟你儿媳去睡觉去。”^[4]其时边区政府共分配庆环分区 290 名征兵任务，但环县一次就向下布置 350 名的任务。特别是由于第二次征兵距第一次间隔时间很短，且正值农历年关，新兵及家属要求春节后再入伍，却被地方干部拒绝，催促一定要赶春节前入伍。一些地方干部在征兵的时候把扩充的新兵员扣在石窑内，新兵员的父亲要来看自己的儿子，然而一些负责同志非但不让看，反用极其粗鲁的语言回说“你家有三个儿子要哭三次，有五个儿子要哭五次”^[5]。这样就在新兵和家属以及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埋怨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失当的工作方式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在当时“已有一些群众发生暴动”，然而这一情况非但没引起领导干部的注意，反倒认为“这是造谣哩”。因此不仅未针对出现的这种情况进行讨论，反而又继续下了一道通知，要求“立即提早完成”，“大量超过没问题”。这种粗暴的工作方式和耍态度、摆威风的工作作风，导致群众认为“革命变化了”，“环县的群众早已与政府脱离”^[6]。这种情绪正好被匪徒赵思忠所利用，进而酿成了这次事变。

五、结 语

“历史一贯忠实于自己的词源学：历史是一种‘探索’。”^[7]通过历史学者的探索形成的真相，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事实集合，是历史学者通过史料资源进行重新“思考”而再现的。不过历史学者无论如何去解释历史事实，每一事实都有自己的时空决定因素，因此历史学者需“把空间和时间作为事实的不可分割的特征赋予事实”^[8]。探究环县事变的事实与真相同样如此。环县事变的发生，在特定的历

[1]《马文瑞谈陇东党史》，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00147。

[2]《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69页。

[3]《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第440页。

[4][6]《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334—335页，第334—335页。

[5]《关于一九四〇年环县自卫军叛变事》，庆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1093。

[7][法]科利：《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8][波]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第229页。

史时空下或许可视为偶发事件,但偶发事件只是在表象的层面上才有其合理性,在表象的背后却体现着深层次的历史本相。黄道炫先生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详致考察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的张力不可能无限制地伸展”,特别是当年“中共的发展,更多的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冲突,当这种冲突趋于平稳、南京政府力量不断上升时,中共受到的压力将空前增大”^[1]。抗战时期的中共所面临的政治社会环境,尽管从总体上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中共革命在乡村社会依然遭遇着难以预料的情状。至少从环县事变中即可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场景:帮会土匪的强大势力、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乡土社会的地缘观念等因素,无疑都是限制和消解中共革命扩张的重要因素。

这也表明,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社会生态异常复杂的乡土社会开展革命,必然会呈现出革命与乡土规则之间融合、矛盾乃至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一方面,革命的开展需要契合乡土社会特定的习惯准则与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乡土社会的固有准则和行为习惯,又会使某些革命政策和措施产生强力反弹,甚至会给革命者造成难以忍受的诸多窒碍。浸淫于小农经济中的传统观念,总会在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中随时体现出来,成为基层民众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而长期形成的地缘观念,不仅规制者乡村民众的行事准则,而且也影响着干部之间的融洽关系。尽管中共以其强大的政治宣传和强有力的阶级革命意识希冀统合乡村社会,但是由于固有的地域观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所以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乡村民众,在对待外来权力的取向和认知上依然体现着鲜明的地域身份认知。如果深入透视散落在中共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尘埃,我们也会发现,建立在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上的经济基础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观念准则与行为模式,在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即便是中共革命向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同样会面临政权的内卷化危机。

[责任编辑:肖波]

Dual Aspect of Facts and Truth

— Exploring Huanxian County Incident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in Anti-Japanese War time

Yang Dong

Abstract: Huanxian County Incident, because of the KMT military friction, tax burden and improper foragers work. However, between the incident statement and the statement truth, it covered a lot of the facts collection reflection historical truth. These facts collection, not only to clarified the incident all the details deep truth, but also were the logical basis connected statement sense and statement truth. Further, the CCP developed revolution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treme backwardness, social ecology very complex, they were bound to show contradictory and even conflicting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volution and the local rules. It also showed that in the absence of local society get reinvented, even the CCP revolution strong penetration to the grassroots society; they also face involution crisis.

Keywords: Huanxian County Incident;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Local community

[1]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7-478页。